

前 言

这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在苦难中奋斗和摸索过来的。在摸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其实，这个教训，一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知道了，可是并没有重视，更谈不上汲取了，以致使苦难的过程，在中国延续了这样久。

鸦片战争的炮声曾惊动过中国，也惊动了日本。可是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统治者一点没有醒悟，依然以天下帝国自居。没有直接受到炮火蹂躏的日本，却汲取了邻邦的教训，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急起直追，在不长的时间内摆脱了挨打的局面。不但这样，而且还参加了侵略者的行列，直接打击和侵略不久以前还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

甲午一战大败之后，才使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重视落后要挨打的教训，要求把民族、国家从落后中脱身。可是要怎样才能脱离落后的局面，尤其是在阻力重重中摆脱落后，他们并不清楚。幸而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不久前还同处积弱地位，而现在已跃居强国之林的日本，就在邻近。一批知道落后要挨打，而想急速脱离落后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日本作为效法的范本，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尽管说是由于路近、费省、文字风俗相似等等理由，但这都只是表面上人所共见的，实际上还是在于日本不但能在短期内从落后的境地中摆脱出来，而且还能摇身一变，由一个被侵略者而成为一个有力量欺侮、侵略邻国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

子想从日本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才能不挨打，怎样才能富国强兵。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懂得要改变国家的面貌，要使国家能长治久安，要使国家能做到真正的富国强兵，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着手，所以他们把向日本学习的重点，置于教育上。

这种想法，从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

甲午以前，中国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曾经提出过在教育方面，向当时先进国家的西方学习的建议，并且也陆续付诸行动了的；可是在顽固的保守势力反对下，很快被扼杀了。甲午以后，虽说局势有所变化，可保守势力的阻力仍然很大，因此他们想以教育作为重点，由根本上向日本学习的建议，要成为行动，还是困难重重的。不过顽固的保守派，他们迷恋于权和势，当他们觉悟到不改变目前的情况，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时，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建议。在这一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东渡到日本，不是求学，就是游历；成批的官吏，也在游历考察的名义下涌到日本。二十世纪初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聚集东京，其原因就在此。让国家民族的下一代，到先进国家去学习，培养他们改造旧社会的本领，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随之而来的动摇腐朽的统治基础的副作用，吓坏了顽固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改革，不要说革命了，比亡国更可怕。于是，又施展故技，企图阻止、破坏青年们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时代是在前进的，人民的觉悟也不会永远停留在原地，1881年撤回全体留美学生和1882年停止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故事不可能重演，闭关锁国也不再能办到。在这情况下，一面为出国留学设置障碍，一面又邀请大批日籍教师前来帮助建设中国的新教育，使改革局限在统治阶层的控制下，按着他们的意图进行。既可以欺骗人民，蒙蔽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而又没有动摇统治基础的危险。不

过，历史有其一定的发展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留日学生和应聘而来的日本教习，为中国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虽然都是失败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及两国文化逆转的情况，也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留日学生，更不必说曾经在二十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了。其原因，可能由于这些是失败的历史，不愿深究，也可能是因为资料缺乏，难以着手。

事情的确如此，可是历史总是历史，客观的存在是无法变更的，何况过去的历史，即使是失败的，也应该研究，以便能汲取教训。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接触过这一段历史，收集过若干资料，也写过一些文章，想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关于日本教习方面的历史，因为其由盛而衰，为期极短，可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尤其是新教育的建立过程中，它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历史不能湮没，也不应漠视。但在我着手研究的时候，虽然距离这段历史时期还不远，大部分当事人也都仍在，可是能搜罗到的资料却极少，尤其是有关日本教习方面的，例如想求一张完整的日本教习的名单，亦不可得。实藤惠秀先生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根据中岛半次郎先生以当事人身份编成的名单，作了增补，但显而易见还遗漏不少。要从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一份接近全面的名单是无法进行的。为此，在四十年代初期，我和实藤先生两人曾遍翻过当时能见到的一些有关书刊资料，走访和询问了能知道的当时担任过日本教习的人，编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名单，准备日后以此为据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回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可能发表我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研究的成果，当然更不必说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日本教习那样比较敏感的专题有所探讨了，因此一些有

关的资料、照片也没有得到利用的机会。一九五六年，我希望实藤先生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所以曾把一些在回国以后搜罗到的资料，抄了一份给他，其中包括对日本教习名单的补充。当时他正在修订留日学生史稿，回信要我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下些功夫；他表示，在他新撰的留学生史中，不想再详述日本教习的事，希望由我来写。这大概就是我和他在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重要问题上的分工。

很遗憾，在接到他信不久，我就不可能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我的研究了，这问题就搁了下来。以后的事，更不必说了。我损失了所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当然包括有关留日学生和日本教习的；我也无从知道国外在这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我重新恢复学生涯，得到实藤先生的信后，才了解到这二十多年来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虽然在留日学生的研究上，有了不少进展，可是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实藤先生重提旧话，要我在日本教习的研究上作些努力，发表文章，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环。他并且说，因为有前约，所以在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对日本教习提得很简单，不像过去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中那样，希望由我补充。

当时，我虽有此心，也感谢他的好意；可是我已丧失全部卡片、书籍、笔记和照片，只凭记忆是写不出文章的。想起他那里还保存有和我同样的部分资料和照片，特别是增补后的名单，所以告诉了他实情，同时要求他把他保存的资料和照片都复制一份给我。很快收到了他寄来的资料和照片，并且告诉我，到目前（1979）为止，日本方面也还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无法找到新发表的有关文章。虽然说他寄来的，没有“小将们”烧去的多，但毕竟有了从事研究的基础，比从零开始要容易得多。

不久，他又替我从东京的图书馆中，把我在四十年代发表过的文章复制寄了来，使我又回忆起在一些小问题上的想法，有机会重新考虑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后来，我利用这些资料（名单是又经过增补、修订的），以我现时的方法和观点，写出了两篇有关日本教习的文章，分别在国内和香港的刊物上发表。实藤先生见到后，又很认真的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并且把正在从事同样研究的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的阿部洋先生介绍给我，还请阿部先生把当时外务省档案中的有关部分复制寄给我，使我对日本教习的名单又得到了一次补充。

我的想法是，日本教习的研究，应该是作为中日关系史，特别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来加以探讨。因此，首先要了解近代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变动情况。同时，日本教习和中国留日学生间的关系是极密切的。这几十年来我虽不再研究留日学生的问题，也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但我仍愿提醒大家，要注意两者间的关系，特别是内在的联系。对于历史的观点，我不承认个人能决定历史，但也不否认个人能对历史起一定的作用，在日本教习的问题上也这样。这里收录了几篇，可能提得不很恰当，但的确是我想法。

我很高兴的知道，日本方面对于日本教习的问题，也开始加以重视。文部省特别拨出专款指定教育研究所加以研究，阿部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春天专诚到中国来收集资料，包括我这份名单。大概在我这本书出版的前后，文部省教育研究所有关日本教习问题的研究报告，亦将公诸学术界。我相信，日本教习这问题将不再是留在两国历史上的空白。

我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道路不平坦，但毕竟还是走过来了，而且还将走下去。其所以能如此，主要当然是在于我自己的意志和决心，从我年轻时代立志以探讨

中日关系史作为我终身事业之后，无论经历怎样坎坷，也没有灰心和气馁，没有中辍我的事业；这就不能不感谢师友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其中最应该一提的是实藤惠秀先生。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一同访求书刊资料，一同讨论研习；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勉励我，要我知道：需要我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要我千万不能气馁；在我书刊、资料丧失殆尽的时候，他尽快把我们共同制作的资料、照片复制后送来，还提供我不少其他便利。尽管在战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他也看不到他所待望的有关日本教习专书的出版（文章，他是见到了的），但在这本专集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纪念，也表示感谢。我没有辜负他的好意，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尽我的可能把有关日本教习的情况、资料介绍给学术界，希望能作为二十世纪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一段重要历史，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让这一段重要的史实湮没。

有关日本教习的资料，我想在我国国内还是可以找到些的，虽然几经变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公私保存的资料、照片都在消灭“封”“资”的口号下销毁了。但我相信必然还有“漏网”的，特别是在比较僻远的地区。我希望这些资料，有一天能公开出来。这不仅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是弥足珍贵的。在档案中，主要是地方的档案和某些曾经聘用过日本教习学校的档案，只要没有被销毁，很可能会找到一些的。例如我曾在我母校前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档案（被销毁以后仅存的一些）中，找到了名单中所漏列的日本教习名字。在历史档案馆中，也可以见到一些日本教习的名字。我相信在其他档案中，还能找到这类材料，因此希望读者们能加以协助，使这份名单更接近事实。

这里收录的一些文章，无论在资料或对一些问题的提法上，只要有使我信服的理由或证据，都是可以商榷、修改的。尽管我从事

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时间不算短，但在水平和观点、立场方面，不足的地方还不少；我的余年虽不很多，但还有时间来作修正，因此请读者们随时给予批评指教，我必将以十分感谢的心情来对待。

汪 向 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

一提起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常有人说中日两国“同文”。所谓同文，就是说文化关系相同；另一个说法是，过去日本因袭了中国的文化，近代中国又学习了日本的文化，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就是互相学习，没有什么特殊可言。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但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实，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过去日本曾向中国学习，近代中国也曾从日本输入西欧的文明，但都没有原样的保存下来，怎么能说没有特殊呢？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文化关系上，渊源相同，有共同相通之点；但也有其特殊与不同的部分。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虽然不能否认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文化关系主要是适应其民族国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的，跟输入的原型决不相同。

每个国家都有其生活环境、社会组织；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就是产生于这种生活环境、社会组织中，适应并且服务于这个环境、组织的。随着文化的发展，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也不断改变，新

的环境和社会组织又产生新的文化。如此循环不已，才有人类的进步。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国家，必然会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吸取营养，尤其是从其邻接的民族、国家中吸收。但由吸收而得的外来文明，如果不能适应其环境和社会组织，就不会得到发展；时间一久，必然遭受淘汰。对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应该作这样的看待。

中国和日本，虽然地处邻接，民族血统中，也有彼此相混成分在内，但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社会组织不同，生产水平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过去，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尤其是在古代，无论在文化上或其他方面都是很落后的，可是和其相近的中国，却早就具有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发达的生产技术；因此日本从中国吸收先进文明，以帮助其社会的发展，是件势所必然的事。隋唐时代，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到日本，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输入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原样的保存下来，而是被日本人吸收消化，成为产生日本文化的营养品和肥料了。也就是说，这种先进的文化被日本吸收后，为了适应其生活环境和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了日本独特文化，不再完全是输入当时的中国文化。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古代同出一源，正如西欧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同出一源一样。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文化的水平、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以致有些日本学者觉得与中国文化同源为耻，声言日本文化是一种没有受过任何外来文化影响，自行创造的独立文化。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客观的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也不能加以改变和掩饰的。作为日本文化标志的文字，尽管一再简化，删减使用汉字的频率，但汉字还在使用，而汉字就是来自中国文化的一个痕迹。此外，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第二次大战后有很多变化，但仍然保留着和中国相似的，或者可以称得上中国式的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在中国已

失传了的习俗，日本却还可以见到。就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也还能见到有古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影子。根据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可以认为：日本的文化是产生在其特殊的生活环境、社会组织中的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化虽然是独立的，而其起源却是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蓝本，经过吸收、消化而创造的。

所谓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当然是不存在的。严格的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以中国文化来说，古代中国文化水平之高，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而且由于数千年来的生活环境，始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情况下产生的中国文化也比较保守；虽然这样，也明显的可以见到有外来文化的渗入和影响，最明显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之后，经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到以后再从中国外输的佛教文化，和印度原来的已完全不同。因此，只要能客观的对待历史，不持任何民族优越感的人，都不会不承认中国文化曾对日本文化发生过影响的；当然我们也承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随地区、时间而相异的。中国文化给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时间是古代，其地区是当时日本生产力最发达，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中心的所在地区。不过历史是有其延续性，不可割断的。今天日本的文化，还是祖承古代日本文化而来；其边鄙地区的文化，也是由文化发达地区扩散而致，所以今天日本文化虽发达，仍不能不认为曾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

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发生关系是很早的，应该说是有关通交往来就开始存在的。

据现在所发掘的出土石器观察，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海平原还存在的时期，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并没有大海相隔，人们可以徒步来往。但是这时候的事迹已不可考，虽然两地之间有些石器的

制造工艺程序相类，但究竟是谁影响谁，还无法证明，所以就不加计入。

有文字可考的记载，应该是从后汉光武中元二年（57）开始。当然，宋以后两国都声称徐福止王不来的地点，就是今天的日本。而徐福东渡，按《史记》的记载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的事。那时日本列岛还处于渔猎为生的绳文时代，没有开化。即使真有徐福其人其事，也真带去生产工具和种子，并率领百工前往，也由于彼此之间在文化方面差距过大，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直到公元 57 年，汉光武帝正式把“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和其他物品，赐给日本列岛上朝贡的倭奴国王。中国的先进文明，包括文化和生产知识，才无疑地传到了日本，但和一般人民的关系，仍然不大。以后到女王卑弥呼时代，中日两国间的来往更多，汉文也成了当时东亚的国际通用文字，日本列岛上来自中国朝贡所奉的表，应该是用汉文写的，其他方面也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当时没有实物或更多的文字记载留传下来，单凭《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是无法判定的；而且当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仍然限于极少数人，对一般人民的影响还不很大，所以也就谈不上吸收、消化乃至创造的事。因此在谈论中日两国文化关系的时候，对汉魏时期，一般也只一提，并不深究。

普通把晋武帝太康五年（285 日应神天皇八十五年 百济博士王仁之携《论语》、《千字文》到日本 作为中国日本两国间文化接触的开始。朝鲜半岛在古代，是作为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来往的桥梁的，汉在那里设立的四郡，不仅是作为汉帝国统治东夷各国的直辖机构，而且也是向这些国家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根据地。日本列岛上和中国的交往，首先就是从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开始；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使者，都是通过乐浪郡的陪送引率，才到达洛阳的。

王仁，据日本史籍的记载，说是汉高祖的后裔，这不一定是事

实。但当时中国大陆上一有战乱，往往就有大批人民向东面移动，有些人就到达了朝鲜半岛。这些人不会就是汉高祖的后裔或同族，但他们到这些“蛮夷之邦”肯定是把中国的先进文明带了去的。无论是文化，还是生产知识乃至生产工具等，都会促使这些民族、国家逐渐脱离落后的境地，进入开化、文明的。日本史籍记载，在古代到日本的中国移民中间，有不少是皇帝裔孙，这大概是以讹传讹，不足为信，但他们传去中国的先进文明，促使日本开化，却是事实。

王仁的携带《论语》、《千字文》等中国儒家书物到日本，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文化接触的开始。汉字的传到日本，并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中国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却是以此为嚆矢的。由此以后三百年间，中国的先进文明，从文化书物、生产知识一直到风俗习惯都逐渐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是间接的。

到公元六世纪末叶，隋文帝统一中国，国威大振的时候，日本列岛上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发生矛盾，上层建筑也无法适应当时的情势，执政的推古女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就需要吸收中国的统治经验，革新朝政，使能和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日推古天皇八年），日本向中国直接派出了使节，企图直接从中国输入、吸收先进文明，不再通过朝鲜半岛间接的传入。以后又几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除了使节以外，使团里面还包括有到中国去学习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小野妹子、鞍利通作、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和僧旻等都是直到今天还见于史籍的入隋日本人。而隋炀帝所遣的答礼使裴世清到日本和其王相见，受到盛大欢迎的事，《隋书·倭国传》中记得很清楚。《隋书》和《日本书纪》中都载有当时两国来往的国书，只是由于没有依照中国封建王朝所要求的规格写国书，使隋炀帝十分气愤。这两次国书，都是用汉文书写的，这说明中国文化标志之

一的汉字，在当时的日本已能加以运用了；经过几百年中国文化的薰陶，日本已经从传入而进到吸收阶段了。

推古女帝时所派遣入隋的留学生、僧，在中国逗留学习的时间都不短，尤其是高向玄理等。他们在中国长时期的留学过程中，不仅熟悉了先进的中国文化，而且也学会了中国的统治方法。他们回国以后，正值日本奴隶主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的反抗也日甚一日的时候，他们把在中国学到的新知识帮助天智天皇，在大化革新中击败了保守的顽固势力。

大化革新，在日本历史上是和明治维新并称的重大政治事件。过去的历史学者称这次革新是一次唐化维新，可以说是在这次革新之后，才清楚地显示了中日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大化革新的中心内容，包括政制的改变等，都是向中国学习；但并不是照搬，而是按照日本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做出恰当的改革。因此说，从隋代开始，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已有了直接接触的关系。由于当时日本在文化上，比起中国来落后太多，急需直追，所以由此以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趋向高潮，中国文化在日本也开始大盛，到唐朝更进入极点。

唐代中日两国间在文化上的接触，不仅见诸于两国史籍，而且到今天也还能见到其遗迹。唐代统治中国以后，日本就像派遣遣隋使一样，派出了更大的使团到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称为遣唐使的。遣唐使，今天历史上有记载可稽的，包括任命后没有成行的在内，从公元 630 年（唐贞观四年，日舒明天皇二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犬上御田锹起，一直到公元 894 年（唐乾宁元年、日宽平六年）因菅原道真的奏章而停派遣唐使为止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一共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其间成行的就有十二次之多。前期的遣唐使规模还不算太大，每次一条船或两条船，每船一百二十人左右；到后期，普通都是四条船，每船人数总在一百五十人左右。或者说，前期

约在二百人上下，后期则在六百人左右。从这个数字看来，可以了解到日本为了巩固其上层建筑，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由中国输入先进文明这点上，显示出多么的主动和积极。

当时遣唐使团中，设有固定名额作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之用，他们的任务就是到中国来学习先进文明。和遣隋使时的留学生、僧一样，他们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后期因情况改变，就比较短了），学习的范围也很广，所以回国后的贡献很大，形成和促进了灿烂辉煌的天平文化。

除了遣唐使团和留学生、僧的功绩以外，中国方面在六至十世纪间两国文化的关系上，也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最初只有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节，中国不过是偶尔有一次答使而已；在促进两国文化关系上，作用不大。可是到唐代情况有了改变，不但有短期的送使，而且还有应邀访日的（其中较多的是僧侣），他们之中，有一部分就长留在异国，没有再返回故土。他们在东渡之初，就意识到海风海浪的危险，准备埋骨他乡的，所以无论在人员的配备上，携带物品的分布各方面都作过一定的考虑。因此这些人对于促进日本文化的繁荣，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关系上，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无怪一直到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日本人民还念念不忘的崇敬他们，纪念他们。

随着大量中国先进文明的传入，日本发生了一些什么显著的变化呢？

从文化的变动上看，一直到十世纪，乃至更晚一些时期，汉字、汉文化始终是上层统治者所专有，和一般人民无关。在唐代以前，即使在统治阶层中，也只限于少数人使用；到唐代这情况才有所改变，中、下层奴隶主也能攻读汉籍，接受汉文化了。有名的吉备真备就是个地方小奴隶主。日本政府更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专供五位以上子弟受教育，也就是专门教育中、小奴隶主子弟的。这所学校



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充满中国文化的气息

中的官制、课程完全是仿照唐制的，连春秋两季也仿效中国，举行释典之礼，所祭祀的又是中国的先圣先师，可以说是原原本本的把中国那一套照搬了过去，全盘唐化。但是，这不是以后日本历史上夸耀的天平文化的实质，只不过是天平文化的孕育阶段。

中国的儒家思想，崇尚忠孝，因此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中，特别重视这一点。日本当时也照样搬了过去，在赋役令中规定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优赏；仪制令中也明示春秋祭祀时，祭田中要留有敬老之田。到天平宝字元年（757）唐肃宗至德二年四月，更下令每户要备《孝经》一册，这可以说是儒家的道德观念移植到日本的例子。和儒家思想有关的阴阳、天文，在奈良时代的日本贵族奴隶主间，也盛极一时；政府的中务省中设有阴阳寮，主管吉凶之兆，设历博士，制订历日。这些无疑也是照袭唐制，是过去日本所没有的。也就是说，日本正从中日文化的接触中，全盘接

受中国先进的文化，从而在这中间吸收营养，培植并产生日本的文化。今天奈良正仓院中所保留下来的一些文物，正是当时大量输入中国先进文明，包括文化和生产知识、工具的证明；这样的例子也存在于当时编纂、撰写的诗文记述中。但是中国的文化，毕竟不能代替日本文化；全盘唐化中，有不能适应于日本这特殊环境和社会组织的，慢慢的就被淘汰。而一种新的，日本自己的文化却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这就是夸称于日本历史的天平文化。

天平文化，虽也有称为唐化文化的，但毕竟不同于盛极一时的唐代文化，更不是唐代文化的日本版，因此既不能还原成中国文化，也不能作为中国文化的局部来对待。而是一种完全产生于日本土地上，日本的环境和社会生活、组织中的日本文化。只有一种能深入到每个人生活内层的文化，才能为他们所接受而日见繁荣、发扬的。当然谁也无法否认这种文化从其孕育到产生再由产生到繁荣过程中是受了中国文化很大影响，和中国文化有深长的渊源关系的。

天平文化虽说是日本文化史中值得夸耀的，但和中国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日本人民对文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还和以往一样，需要吸收输入，以便从中汲取营养，不断地革新和创造新的日本文化。

公元 894 年日本停派遣唐使之后，日本就通过来往于两国间的商船来输入中国的先进文明。到宋朝统一中国之后，日本又因为本身经济力量的关系，而没有能力像隋唐时代那样，派遣官方代表到中国，可是吸收输入中国先进文明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比唐末要活泼频繁了。

隋唐时代，把中国文化、先进文明传到日本的主要是官方的使团和留学生；半官方的僧侣虽然也承担着同样的使命，但由于性质

的不同，所以他们着重于已经中国消化了的佛教文化，或者说是用佛教形式表现的中国文化。

宋代，日本没有官方的使节和留学生到中国，但是僧侣们到中国，却没有间断过；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正史中也有记录。他们不仅到中国来吸收先进的文化，而且还把已经消化了的中国文化，也就是经过他们吸收、消化而创造的日本文化带到中国，进行文化上的交流。僧侣，虽然也承担着输入中国文化的使命，但由于性质的不同，表现的方式也相异。因此有宋一代，通过僧侣而传回日本的中国文化，以和佛教有关者为主，涉及其他文物、制度者甚少，至于生产知识更寡。这些与佛教有关的中国文化，以后在日本也起了一定作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部分。例如鎌仓时代的禅文化，应该说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南宋以后，中国国内局势不十分稳定，有些和佛教艺术有关的技工，也有东渡到日本的。宋末，更有些人流亡到日本，他们或有一技之长，或精于五典；到日本后，对更新和重新创造日本文化，也起过相当作用。例如在寺庙的建筑上，在美术工艺品的制造上，甚至连武士道思想的养成上，都可以见到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但这种文化，仍然只是在日本这个特殊环境、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日本文化，它受过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可决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

十四世纪中叶，也就是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生产水平已很高，就是日本的生产力也有极大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很大进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来往，虽然还要依靠风力，但已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凭风和潮，而可以由人力决定了。中国和日本、朝鲜乃至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航路已经开辟，只是由于明朝执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以致没有公开的商业贸易存在。但是历史的潮流，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明代，外国和中国间的贸易，是以朝贡或走私的方式表现出